



冯契学述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

DANGDAI
RENWEN SHEHUI
KEXUE MINGJIA XUESHU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ISBN 7-213-01676-8



9 787213 016769 >

ISBN 7-213-01676-8/G·455

定价: 13.3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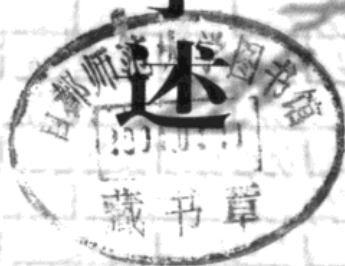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

B26/101

主编 林在勇

冯契著 陈卫平等 整理

冯契学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28734

丛书策划:周游工作室
责任编辑:周向潮
封面设计:信天翁工作室
责任校对:张振华

冯契学述

冯契著 陈卫平等整理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6 万
插 页 2
印 数 1—3000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676-8/G·455
定 价 13.3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冯契先生 1994 年 11 月在书房



冯契先生部分著作

不论处境如何，始终
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
爱智者的本色。

冯契

冯契手迹

目 录

MULU

冯

契

学述

导论 智慧说与我的学术研究 1

智慧说与时代精神 2

理论、方法、德性 10

把握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 23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23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28

中国哲学历史进程的鸟瞰 44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 81

心物、知行关系 82

感性直观 86

理论思维 92

科学知识和逻辑 98

“一致而百虑” 105

具体真理和辩证思维 112

自然界及其秩序 116

心灵与人性 123

智慧和自由 129

逻辑思维的辩证法 140

辩证逻辑思维的基础和开端 140

哲学、科学和逻辑的历史联系	146
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	161
辩证思维的根本规律、逻辑范畴和方法论	174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	205
自由作为哲学范畴与人的本质	206
评价、价值和价值体系	215
文化各领域的价值和理想	225
走向真善美的自由境界	251
附 录	261
年 表	263
著述目录	277
研究评介资料	279
后 记	281

导论 智慧说与我的学术研究

我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种著作，对自先秦直至 1949 年止的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作了粗线条的描绘；二是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我自 40 年代开始便一直关心着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经过 50 年的探讨，从广义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角度，写了《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本书稿，合称为《智慧说三篇》。这两方面的研究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我的智慧说理论是在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哲学史，并同西方哲学作了粗略比较后形成的，而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则着重于探讨民族智慧的特征及其形成的思想历程。因此，可以说我的学术研究是由探求智慧而贯通一气的。

智慧说与时代精神

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要求表现时代精神，我对智慧的探求自然也不例外。

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进高中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5年进大学时碰上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在那个时代，一切爱国青年、有志之士，都满怀忧患意识，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苦恼、思索。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那就是：怎样有分析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以便会通中西，正确地回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繁荣富强的道路。这样的“古今中西”之争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

在“古今中西”之争的制约下，中国近代哲学的历史观问题特别突出，因为“古今中西”之争直接涉及如何看待社会历史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同时，要求会通中西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迫切问题，要把从西方学到的先进理论运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如何正确解决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所以认识论问题在中国近代也特别突出。而与认识论

和历史观问题相联系着，逻辑和方法论问题、自由学说和价值论问题，也成了哲学家特别关注的领域。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古今中西”之争，使近代中国人面临着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因此这两方面的哲学探讨也突出地贯穿于中国近代哲学史之中。简言之，时代给哲学领域提出了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哲学本身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即从哲学家对现有思想资料的批判继承来说，中国近代哲学既有与自己的传统哲学的纵向联系，又有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横向联系。与民族经济将参与世界市场的方向相一致，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是发扬民族特色而逐渐走向世界，将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从哲学本身来看，也有一个古今中西的关系。一般地说，凡是在中国近代起了积极影响的哲学家，总是善于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和中国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以回答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从而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这样的哲学因为回答了时代问题，就体现了时代精神。

不过，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它通过思想家个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而体现出来。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了时代的矛盾（时代的问题），就会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如哲学的某个领域里），形成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这具体的问题，使他感到苦恼、困惑，产生一种非把问题解决不可的心情。真正碰到了这样令人苦恼的问题，他就会有一种切肤之痛，内心有一种时代责任感，驱使他去作艰苦、持久的探索。时代的矛盾一定要通过个

人的感受而具体化，没有这样的真切感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著作。

我在哲学领域真切感受到的，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我早就对哲学有兴趣，大学报考的就是哲学系。当时的考虑是：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我对数学、科学、文学、哲学都爱好，学哲学大概最能满足我广泛的兴趣。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我涉猎甚广，中外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但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个哲学问题非要解决不可，是在昆明清华文科研究所作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我跟从金岳霖先生读书，认真读了他的《知识论》手稿和《论道》。在与金先生的讨论过程中，我感到碰上了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金先生在《论道·绪论》中区分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他认为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人。研究知识论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用客观的、冷静的态度去研究。但研究元学就不一样了，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要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结果上，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这是金岳霖先生区别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的论点。

我当时觉得这样的区分是有问题的。金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对他说：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不能离开“整个人”，我以为应该用 Epistemology 来代替 Theory of Knowledge。广义的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而且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认识论研究中，也是不仅要

求理智的了解，而且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金先生听了我的意见后说，他讲知识论，确实只讲知识经验，即他所谓“名言世界”。他认为我讲的“智慧”，涉及了“超形脱相”、非名言所能表达的领域，这个领域是理智无法过问的，只好交给元学去探讨。不过，讨论到后来，他又说：“你的话也有道理，你的看法可能还更接近中国传统哲学。”他鼓励我循着自己思路去探索。在这之后，他与我几次讨论到名言世界和非名言世界的问题。金先生说他在写成《知识论》之后，要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因为他认为“治哲学总会到一说不不得的阶段”，说不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这是他当时甚感兴趣的哲学问题。

我后来认识到，我和金先生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关于元学的智慧如何可能（以及自由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包括两方面：首先要问如何能“得”？即如何能“转识成智”，实现由意见、知识到智慧的转化、飞跃；其次要问如何能“达”？即如何能把“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亦即说不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如何去说。金先生当时着重探讨了后一个问题，写了《势至原则》一文，收在他的论文集中。我当时有一个与他不同的想法。我认为虽然智慧的获得与表达不可分割，但首先应该问如何能“得”，其次才是如何能“达”。所以，我想着重考察前者，把由意见、知识到智慧的发展视为辩证过程，试图来说明“转识成智”是如何实现的，亦即想探讨一下从“名言之域”向“超名言之域”的飞跃的机制。我跟金岳霖先生、汤用彤先生就此问题作了几次讨论。后来我从庄

子《齐物论》中得到一些启发，在 1944 年写成一篇论文《智慧》，后来发表在《哲学评论》上。当我写好后，自己感到不太满意，因为它显得太学院气了。但我确实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并对这个问题有真切的感受。从这以后，知识和智慧、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的关系到底如何，便成为我一直关怀、经常思索的问题，再也放不下它了。

那么，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有什么时代意义呢？

在与金先生讨论知识论态度和元学态度问题之后，我越来越感到，他内心有一个类似王国维的“可爱与可信”的矛盾。王国维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静庵文集续编·自序》）其所谓“可爱者不可信”，是指叔本华、尼采这一派哲学，即西方近代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的传统；其所谓“可信者不可爱”，是指孔德、穆勒以来的实证论、科学主义的传统。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论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是近代西方科学和人生脱节、理智和情感不相协调的集中表现。王国维感到这一矛盾很难解决，因而产生了极大的苦闷。他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于是就放弃了哲学研究。但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继续发展着。在中国，“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正反映了这两种思潮的对立。

金岳霖先生区分了知识论态度和元学态度，以为知识论是只讲可信的即实证知识的领域（即只讨论实证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元学则不然，它不仅要求理智上的了

解,而且要求情感上的满足,即要求是可爱的。他实际上是试图用划分不同领域的办法来解决“可爱与可信”的矛盾。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办法是把知识和智慧截然割裂开来了,从而难以找到由知识到智慧的桥梁,也无法解决科学和人生脱节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金先生也没有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矛盾。

在五四时期,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与东西文化论战相联系着。科学派多半是西化派,强调以现代西方科学为基础来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玄学派认为人生观领域非科学所能够解决,多数强调东方文化有其优越性。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讲“天人合一”,自然与人生统一于道,哲学家之道与哲学家之人格应是统一的,在人生观问题上,正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中国传统。客观地说,这两种观点都有其理由,也各有其片面性。但论战正好说明,科学和人生的关系问题,确实是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就中国来说,既需要科学,也需要人文精神,“五四”提出的科学和民主两个口号不能偏废。但是,人文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又是有区别的。自然科学一般说来已经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我们可以直接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来为我国的现代化服务,物理学、化学等也无所谓中国化的问题。人文领域则不同,既要克服民族局限性,又要保持和发扬民族特色,并且越具有民族特色,就越有人类的普遍意义。哲学既涉及自然,又涉及人文。怎样使中国哲学既发扬中国的民族特色,又能够会通中西,使它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许多中国学者都在考虑和要解决的问题。由于中西方哲学的交流和

会通，是否有可能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立的问题，这也是值得哲学家郑重考虑的大问题。

科玄论战、东西文化论战，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关心的问题，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参与了这些论战。我们那一代爱国青年，很多人在“一二·九”运动和抗战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这种革命青年的共识，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正因为政治上有这么一种信念，于是在理论上也相信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满怀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我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开始读得很杂，有苏联人写的，有中国人写的，包括李达、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也有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但最使我心悦诚服的，是在抗战期间读到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

我是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抗战初期，因为平型关、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许多人盲目乐观，以为抗战不要太久就会胜利结束。但接着打了许多败仗，日军长驱直入，很多城市都沦陷了。在前线，我们亲知国民党那些杂牌军确实腐败得不得了，而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又比较弱小。抗战的前途究竟如何，使大家感到困惑，同时存在着许多思想问题。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出来，给大家指明了前途，使我们豁然开朗，解除了困惑，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

以言表的。这本书以其理论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们，它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基本要素，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中什么是占优势的可能性，中国人将如何通过持久战来最后获得胜利。记得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被吸引住了，一口气就读完了，后来又反复地读。《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到理论的感染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可以说，这本书是继《资本论》之后，运用辩证逻辑的典范。

《新民主主义论》是我到昆明之后读到的。这本著作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一个历史的总结，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原来困惑着我们许多人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一个农民国家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等等，当时在爱国青年中间常争论不休。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历史特点，并把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考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得许多疑问、困惑迎刃而解，从而对一百多年来政治思想上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历史性的总结。与此相适应，在文化上，毛泽东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亦即“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既反对了全盘西化论，又反对了中国本位文化论，正确地解决了文化领域中的古今、中西的关系。毛泽东是站在哲学的高度来解决问题的，他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一词，既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关